



李先念传

1949—1992

李先念

ISBN 978-7-5073-2812-7



9 787507 328127 >

定价：130.00元(上、下)

李先念传

(1949—1992)

下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先念传. 1949~1992/《李先念传》编写组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73-2812-7

I. 李… II. 李… III. 李先念 (1909~1992) —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1324 号

李先念传 (1949—1992)

编 者/《李先念传》编写组
责任编辑/边彦军 张文和 于丽娟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http://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680×960mm 16 开 87.25 印张 109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ISBN 978-7-5073-2812-7 定价: 130.00 元 (上、下)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十四章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 日常工作(上)

中共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混乱局面有所遏制。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恢复国家正常秩序。这期间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李先念倾注全力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的日常工作。他精心组织协调国民经济的运行，安排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筹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积极参加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大力推进解放干部、落实政策工作。

恢复国务院职能

在正常年代，讨论决定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按照议事规程是总理办公会议，或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但这时，国务院副总理有的被打倒被审查，有的身体状况不佳，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国务院正常的工作秩序有待恢复。周恩来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后，决定由新组成的国务院业务组讨论决定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国务院业务小组从一九六七年春成立以后，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浪潮一次次的冲击，工作时常中断，人员也随着政治风云变换而更

换，因此业务组亟待加强。

经过反复酝酿，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国务院业务组调整方案。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①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刘西尧^②为列席成员。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随后业务组进行了大体分工：

周恩来，管外交、科学、统战。

李先念，管财政、银行、外贸、卫生、国务院直属单位。

纪登奎，管农业、商业。

谢富治，管公安、政法。

李德生，参与管国防工业，后管水电和体育。

李富春，管冶金、水电、机械、轻纺。

粟裕，管国防工业。

苏静，管计委、建委、煤炭、石油、化工。

余秋里，管计划、铁路、交通、邮电。

由于周恩来工作繁重，难以经常出席业务组研究讨论日常工作的会议，所以大多是由李先念和纪登奎商议后召集，然后把讨论的情况和议定的事项报告周恩来，由周恩来审定或转报中共中央批准后，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实施。

七月二十三日，李先念主持重新组建的业务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水灾、防汛、恢复职工附加工资、招工来源、提前修建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段铁路及其他工程项目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讨论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形成《会议纪要》第一号报告周恩

^① 苏静，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军管会主任。

^② 李震，时任公安部军管会主任。邱国光，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刘西尧，时任联系科学院的联络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来，并分送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九月二十五日，李先念又主持业务组会议，讨论自身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问题。议定业务组一定要抓好两头，一头是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及时传达和贯彻下去；一头是下面的情况和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并向中央反映。还议定要经常务虚、虚实结合，立足于全局处理具体业务问题。确定国庆节以后开始研究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发展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及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为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做准备。

从此业务组的工作程序日益完善，运转渐趋正常。会前把要讨论的事项印成文件，会后写出纪要。到年底，共印了六十六份会议讨论文件，十期会议纪要。

在国务院业务组调整、充实的同时，对国务院各部委的精简、合并也开始酝酿。根据毛泽东精简机构的指示精神，一九六九年初，周恩来就提出国务院各部委由六十二个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左右的设想。此后国务院业务组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多次讨论酝酿国务院机构精简、调整问题。六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将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机构合并问题的文件，送给周恩来审阅，并请示两个问题：“一、可否在较大点的范围讨论机构合并问题。二、合并的工作很细致，既要把部门合并好，更要作到思想一致，因此工作不能粗心大意。为此，请总理有时间的时候，再作一次指示。”^①经周恩来同意，李先念又召集国务院各部委军代表讨论部委合并事宜。他强调指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成效地做好工作。”精简机构要做深入细致艰苦的思想工作，“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不能简单化，不能怕麻烦。”“对不同意见决不能采取压的办法”，对的就采纳，不对的就做解释说

^① 李先念给周恩来的报告，1969年6月21日。

服工作。具体部署：第一步，讨论机构合并还是不合并，解决统一思想问题；第二步，讨论合并后的工作任务和范围；第三步，讨论机构设置、编制、定员问题；第四步，讨论领导班子组成问题；最后才是人员的去留问题。^①

九月二十五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后，提出国务院各部委合并及名称建议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开始机构合并的运作。经过半年多的反复征求意见和讨论，确定了国务院新机构的设置。国务院由原来的六十二个部门合并为二十六个。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调整、精简、合并，国务院拟设立二十三个部委（包括国防工业六个部）、两个组（文化组、科教组）和一个办公室。”^②报告还明确了各部、委、组、办的领导关系，领导人员构成，工作任务和权限，建立革命委员会和设立办事机构等问题。规定了各部、委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其大权集中在中央。各部、委革命委员会的权力与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有所不同。各部、委革命委员会对本部门的工作方针、政策、计划有讨论建议之权，对人事、财务有审查之权，对工作实施有监督之权。各部、委的日常工作，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由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负责管理，对外行文仍用部委的名义。后来，李先念、纪登奎向周恩来报告，提出国务院建立政工小

^① 李先念同各部军代表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② 合并后的各部委名称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冶金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业部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工业部、农林部、财政部（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名义）、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公安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其中，除第七工业部、卫生部外，都提出了革委会主任人选。国务院办公厅等22个单位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国务院办公厅等极少数单位未成立革命委员会。

组，并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批准。这样，国务院共二十七七个部门。国务院可以领导各部委开展日常工作。

在国务院调整机构的过程中，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边防部队侵占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挑起武装冲突，造成局势紧张。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讲话时说：“我们要准备打仗。”“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当年九月，中苏两国总理虽然达成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临时协议，但为了防止对方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仍强调要做好精神、组织和物资上的准备，并于十月发出了“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的林彪，却在十月十八日，极不寻常地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正式下达，动员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很不高兴，烧掉了。林彪这一举动，对国务院工作造成很大干扰，迫使业务组不得不把工作重点一时转到备战上来。李先念和纪登奎、李德生连续召开业务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加快下放国务院各部门人员的办法，科研设计单位和在京高校搬迁问题，研究布置有关战备事宜，并写出了《关于紧急转移战略储备物资的报告》、《关于政府机关档案备战措施的报告》，还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要疏散黄金和钞票等。由此，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和准备讨论解决的一些重要经济问题又一度被打乱。直到这年底，全国的备战状态才逐步解除，国务院也开始抓经济工作。

在计划经济年代，恢复和理顺国民经济秩序首先要抓计划工作。李先念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主要是管财贸工作。为了进一步了解工交等部门和全国的经济情况，在准备召开计划会议时，他和业务组其他成员一起听取各部门的情况汇报，支持

各部门先召开专业会议，讨论制定本部门的计划方案。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余秋里写信给李先念，报告计划会议的准备情况。信中说：“遵照总理和您的指示，我们对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项目作了初步排队，并对一九七〇年生产指标和财政收支指标作了调整。兹送上《关于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安排说明》、《（一）抢建的重点项目、（二）争取全部和部分建成投产的项目、（三）需要认真安排好建设进度的项目》、《一九七〇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初步设想》、《一九七〇年国家预算指标初步设想》各十四份。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计划和物资平衡表正在付印，明日送上。计划纲要正在修改。”以上这些文件是计划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一日，召开了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全国计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军工、工交、农林、财贸等部门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五人。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指示。会议期间，李先念分别到军工、农业、交通、工业、财政、物资、基本建设、劳动工资和物价、统计、文教各组听取意见，积极协调解决各地区、各部门提出的问题。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他和余秋里等多次修改会议文件和《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的综合报告》。他还连续四次召开国务院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和部署当年生产问题，着重阐述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两千一百万吨钢，改变钢产量“十年徘徊”在两千万吨以内的重要意义。三月十七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四月四日，周恩来对《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综合报告》、《一九七〇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作了修改，并批示：送（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同志审阅后，立即付印，限四日分送毛主席、林彪，政治局十六位同

志，军委办事组、国务院业务组各同志。另外给我两份。李先念又作了修改，随即付印分送。这两份文件，经八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

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当时国务院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中央所属企业下放给各省、市、区的方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这一方案，并提出一九七〇年内国务院各部直属的大部分工业企业应当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企业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为主。李先念主持业务组会议多次研究实施办法，哪些企业下放，哪些不下放，下放的企业中央如何管理等。由于东北地区中央管的企业比较多，他和余秋里、苏静先召集东北三省负责人和冶金、煤炭、铁道部军代表研究钢铁、煤炭体制改革问题，并与李富春联名向周恩来报告商定的情况：

一、鞍钢下放给辽宁省，实行双重领导，以省为主，市、厂合一，革委会工作重点放在鞍钢。冶金部对鞍钢的生产、基建计划和外部协调工作暂不变。给鞍钢补充一万七千名工人。

二、鞍钢的钢铁学院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给鞍山市，合并办钢铁大学。

三、冶金部设在长春的黄金公司撤销，金矿下放给各省管理。

四、煤炭部派驻的东北各省煤炭管理局撤销，由各省管理。矿和市政合并还是分开，由各省研究确定。

五、陈锡联提出两条建议，铁岭——彰武段铁路修起来，开发盘锦石油和天然气。^①

^① 李先念、李富春关于钢铁煤炭企业体制改革给周恩来的报告，1969年5月3日。

李先念对《商业部主管的部分单位下放情况的报告》作了五点批示：

一、商业学校（当时商业学校五个）可以下放。不办的院校，安置工作必须做好做细。

二、一级站（当时采购供应站共四十四四个）不放为好。实行双重领导，部管为主，党政工作归地方。

三、储备仓库（当时共一百四十四四个）下放与否，都必须明确是储备中央商业部商品为前提条件。

四、基本建设项目（当时共一百六十八个）是否下放，要重新研究。

五、工厂（共十三个）可以下放，但既然产品是面向全国，那么产品必须由中央商业部调拨，有余力可以接受地方制造与加工任务。^①

在部署中央所属企业下放的过程中，李先念一再提醒各部门的负责人，对下放企业不能放手不管、一放了事；要经常了解反映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向中央报告。

这次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的，包括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厂等共二千六百多个，是建国以来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也是改变经营管理体制的一次探索。由于改革是在“斗、批、改”这一“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盲目性比较大，不该下放的企业下放了，破坏了经营管理的连续性。

稳定农村局面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冲击亦

^① 李先念对商业部军代表《关于我部主管的部分直属单位下放情况的报告》批语，1969年9月3日。

很严重。一些地方派仗激烈，武斗不止，农民难以进行正常生产。一些地方农业基本建设工程遭到破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被削弱。全国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作表面文章，不学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而着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搞并队，搞大队核算制，没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业务组采取了一些稳定农村的措施。

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防汛抗灾。七月，周恩来、李先念听取水电部军管会汇报全国防汛情况，研究部署防汛工作。周恩来作了重要指示。李先念讲了话。由于全国主要河流几年没有进行治理，险情隐患丛生，所以李先念指出：“对淮河、黄河、海河、长江，要全面地、认真地逐段进行一次检查，不仅高水位不出危险，而且低水位也不能决口。要提高警惕，防止麻痹，在低水位时也不要麻痹。”^①

进入雨季后，李先念随时注意各河流的汛情，要求水电部每天检查一次防洪工程修复情况和防汛措施，并向国务院值班室报告。这年长江流域雨量比较大，一些地方发生水灾。七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灾情和防汛工作，并及时派出工作小组到受灾地区了解灾情，提出救灾办法，稳定灾区人民情绪。

海河流域的防汛工作，李先念最担心是保定地区。由于两派武斗，安国、雄县、蠡县、高阳、安新等县对防汛工作无布置，特别是白洋淀的千里堤无人防守。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水电部虽然向河北省负责人和三十八军领导说明了情况，但一时解决不了问题。李先念听到这种情况后，先向周恩来报告，又亲自

^① 水电部军管会防汛办公室电话传达稿，1969年7月24日。

给河北省负责人打电话。根据周恩来意见，他还向当时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谢富治通报情况，要求三十八军注意防汛工作。

地处我国腹心地区的淮河流域，是农业工作的重点地区，又是水、旱、涝灾多发地带。这个地区总面积达二十六万平方公里，跨豫、皖、苏、鲁四省，当时有九千万人口，二亿亩耕地。淮河历史上形成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状况，经过近二十年治理，面貌虽有所改观，但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水平仍比较低，抗御一般水旱灾害的能力还不够，抵御特大洪水的威胁没有解决，一遇水旱灾大批农民就四处逃荒要饭。为稳定这一地区农村和农业生产，从一九六九年开始，李先念又把治理淮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七月二十日，他将淮河流域的滁河水利规划批给余秋里：“一、我意滁河流域水利规划，请水电部认真审查。二、滁河流域旱的年份多，涝的年份少。不过今年是涝年。这个工程的设计，在认真进行审查之后，如果合理，可以考虑列入一九七〇年和长远规划。整个工程的建设，时间还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必须注意所修建的水库，即使库容量不大，也要保证质量。”^①而后，他向周恩来和中央建议重新成立国务院“治淮规划小组”，由李德生任组长，水电部和苏、鲁、豫、皖四省各出一负责人为成员，办事机构设在水电部。

十月二十五日，李先念主持业务组会议，讨论《淮河规划组第一次会议纪要》。他在讲话中指出：“要肯定成绩”，批评了那种“治淮治淮，越治越坏”的说法，强调要总结经验教训。要改变前几年只注意蓄水，不注意排涝的作法，明确按照建国初期政务院时决定的“蓄泄兼筹”方针，该蓄就蓄，该排就排。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淮河上游修山谷水库，加强水土保持；中游要注意防洪，确保淮北大堤的安全；下游疏通和加宽河道，增

^① 李先念对滁河流域水利规划的批语，1969年7月20日。

大泄洪量。四个省实行统一规划，分别部署，集中力量在一定时间内治理一条河、一个地区。^①

会后，钱正英率勘查组到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查勘，具体部署四省的治淮工作。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三日，李先念、李德生听取了钱正英汇报，对这次查勘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李先念说：对水电部同志是进一步了解情况，对四省同志是相互了解，许多问题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增强了团结。过去治淮扯皮很多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解决。有些地区一个时期蛮干，一个时期不干，现在要好好干。他强调：“水利工作一定要照顾全局。水利工作最容易犯片面性，最容易从局部出发，也最不允许从局部出发。”希望大家按照治淮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走群众路线，下苦功夫改造自然，把农业搞上去。^②此后，四省的治淮工作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和要求，按照规划展开。

中国北方地区是农业发展的薄弱和关键环节，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一九六六年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抗旱会议，解决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工作被中断。一九七〇年，周恩来和国务院业务组又重新抓这项工作。

六月二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京、津、晋、冀、鲁、豫、辽、陕、甘和内蒙古北方十省、市、区农业会议，解决粮食生产上“纲要”的问题。议定由国务院主持召开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十省、市、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人外，还请皖北、苏北有关负责人和各省、市、区选择一批大寨式的先进县、社、队代表参加。针对前几年领导农业方面出现的思想混乱，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放开让大家

^① 李先念在淮河规划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10月25日。

^② 李先念听取钱正英汇报时的讲话，1970年1月13日。

讲，用典型讲话，充分揭露矛盾，通过总结经验、对比，找差距，激发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革命精神。业务组会议还议定立即组织五人小组进行筹备工作，成员由水电部、农林部、一机部、商业部主要负责人组成。初步设想在八月或九月召开十省、市、区农业会议。

在会议准备期间，李先念随时关注协调各方面的意见，解决增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等问题。他考虑到青海、宁夏、江苏、安徽四省区的情况和要求，同意这四省也参加会议。这样，就扩大为十四个省、市、区北方农业会议。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李先念到河北省任丘、河间、饶阳、衡水、武邑、交河、阜城、枣强、南皮、黄骅、沧州、霸县等县调查研究，走一路讲一路，总结和推广河北地区抗旱打井、改造盐碱地的经验。

北方农业会议于八月二十五日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一千二百五十余人，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农业会议。会议先组织代表到大寨参观，后在北京举行。此时正值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李先念前往出席会议。由于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发难，致使会议日程改变。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李先念回北京替换纪登奎主持国务院工作，派李德生回北京接替黄永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九月一日，李先念和李德生一起听取农业会议领导小组和各省的汇报。当听到代表们参观大寨和昔阳县很受感动和教育时，他说：“看了感动，想想激动，回去不动。这次你们要改变一下，回去要来一个大动。”他还多次插话，强调以下几点。一是缺粮省必须改变农业落后面貌，但不能性急蛮干。粮食生产一年搞上去不容易，要“艰苦奋斗，狠狠抓几年”；二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征购过头粮”；三是北方打井抗旱，要有长期安排，“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四是改变农村所有制要慎重，批评一个县要全面改变所有制是

“冒失鬼”，指出搞“无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最后他要求会议研究几个政策问题。

九月九日，李先念和纪登奎再次听取会议领导小组汇报。李先念着重讲了学大寨出现的偏差。他说：“我们把毛主席教导的所有制思想都忘掉了，有的就用平均分配代替按劳分配。”学大寨注意“不要搞花架子”，“不要搞瞎指挥”，“要实实在在地干”。要批判右，又要堵死“左”，正确理解和处理突出政治和抓生产的关系。这次会议议定，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一步研究农村政策，就三级所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劳动报酬、积累与分配、社队办企业等问题搞出文件来。

这时，商业部、外贸部也在召开工作会议，国家计委负责人段云参与起草这次会议的文件。九月二十五日，李先念修改北方农业会议报告的讨论稿后送给段云参考，并非常赞赏地说：“对你们起草文件有启发，特别是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讲得好。”关于农村政策，《报告》提出：《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凡是关系到当前人民公社重要政策变动，都必须事先请示报告，各地不能擅自行动。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在保持集体经济绝对优势条件下，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既要批判“分光吃尽”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不要因为强调国家计划，就损害生产队因地制宜的自主权；不要因为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就搞“一平二调”，破坏等价交换原则；不要因为动员农民支援国家建设，就过多地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报告》中还阐明了发展北方农业的紧迫性，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李先念在修改《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稿时，几